

政协委员认为,大同行评议和末位淘汰已呈现负面效应—— 国家重点实验室遭遇评估尴尬

两会观察

本报记者 操秀英

3月7日下午政协科技界别联组会结束后,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张德兴委员赶紧将他的书面发言稿送到相关领导手里,希望把意见带上。

让他如此关切的是如何更好地加强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

“历经30多年发展,我国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备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成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充分肯定成绩后,他话锋一转,“但是,目前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管理、运行、评估机制也存在一些缺陷,亟须有关领导重视。”

首先,他认为,5年一次的新一轮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在原则上出现了问题。“本轮评估采用‘大组、大同行’的模式,摒弃了此前形成的基于‘分类评价’‘同行评议’原则的评估

体系。”张德兴说,这很令人不解并引起广泛争议。

他举了一个例子。归属于基础生物学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涉及神经科学、植物科学、结构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工程、微生物学等诸多学科,共安排了30位评估专家,熟悉上述任一学科的专家只占极少数,可能只有四五位。

“很难设想一位评估专家有足够宽泛的专业背景对多数实验室进行科学评价,对于任一实验室显然都无法做到同行评议,因此,SCI、影响因子等在不同学科间差异显著的定量指标,势必在评估中产生巨大影响。”张德兴说。

结果是,学术期刊影响因子普遍较低的非热门学科、特别是经典学科处于弱势地位,从而进一步压缩我国经典学科以及非热门学科本已狭小的发展空间,而这些学科常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基于这一评价体系实行的末位淘汰加剧

了这一负面效应。“国家实验室评估的‘末位淘汰制’造成的问题很严重。”在前一天的小组讨论上,张德兴更为直接地指出问题。

在那次的讨论中,中科院微生物所前所长黄力委员回忆了一位从事地学研究的科学家朋友的“惨痛经历”:有一个实验室主任,因为评估排在末位,就跑到主管部门去问“为什么要把我的实验室摘牌”,结果管理部门说“因为你排在最后一位”,没有别的理由。就在那次评估的前一年,这个实验室还被评为“优”。

科技日报记者7日联系黄力委员所说的这一实验室的负责人。她告诉记者,这件事对实验室造成巨大打击,她本人及另外一位院士均已离开,“眼看着一个有20多年历史,在国内外都知名的、中国大陸钻探做得最好的实验室就这么衰败,大家都心痛。”电话里,她依然难掩激动之情。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家对重点实验室给予专项经费资助,被末位淘汰

掉的当然就没有这些资助了,很多项目做不了,人也留不住”。张德兴说,长期下去,负面影响很大。

正因如此,尽管他所在实验室评估结果较好,但他还是代表科技界同仁来急切呼吁解决这一问题。

张德兴建议,在国家实验室评估中回归分类评价和同行评议的国际学术评价基本原则,舍弃简单粗暴的末位淘汰机制,采用差别支持的手段。

此外,就具体运行细节,张德兴还提到,应尽快修改2008年颁布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明确专项经费中的基本科研业务费必须平均分配给每位学术带头人,以保证科学家能够实实在在地开展持续深入的系统性研究;放开对科研仪器设备费的原有限制,赋予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支配权;允许有条件地列支国家重点实验室专职仪器管理人员的工资。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科技界女委员 讨论报告

3月7日上午,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政协委员在驻地举行小组会议。

图为小组会议间隙,科技界别女委员一起讨论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十年了,挤占科研时间的杂项还那么多

两会话题

本报记者 张晔

“科学家到底有多少时间从事科研呢?我刚拿到了一份科协九大代表系统中直接从事科研的一线代表近百人的调查结果,他们每天工作时间平均超过10小时,大体上是直接研究、间接研究、无关事项约占三分之一。”

3月7日,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齐让委员一番发言让会场沉寂下来。

齐让介绍,早在2007年,针对科研人员有效科研工作时间问题,中国科协通过问卷调查了全国1300多位科研人员。2011年,针对

同样问题,中国科协再次开展调查。

10年过去了,尽管三次调研的组织方式和方式不同,但是主要问题和基本结论变化不大。一是直接从事科研时间所占比例不高;二是间接科研时间所占比例偏高;三是非科研时间所占比例过高。

齐让话音刚落,坐在对面的中科院院士沈保根委员就抢过话筒。

“现在评价科研机构 and 科技人员时,过分强调刊物的影响因子。”沈保根说,虽然没有哪个部门这样规定,但是给评估表里填的就是这些内容,“把它作为硬性指标,多了就好,少了就不好。”

“这样就引导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包括学生都要往这方面去努力。”沈保根说,

为了把文章投向国际一流刊物,许多科技人员要一稿多投,收到反馈后还要反复修改,占用大量时间。“我们究竟是要年轻人把基础研究的目标针对某一个杂志发表一篇文章,还是按照科学的发展规律去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

话题也引起了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张勤委员的共鸣:“各个部门为了让工作有抓手,于是就有了各种牌子、帽子,而且太多,让科技人员成天应付那些申请、检查、验收。”

张勤说,一线工作的科技工作者真正需要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所以,必须从国家层面引起重视,少一些这样的抓手,这样才能让科技人员把时间放在科研上。

“我们在工作中很重视钱,有预算、决算、巡视等监督管理措施。”齐让感慨地说,“但是我们不重视时间,对于科研人员来说,他们的时间就是宝贵的资源投入。”

他为此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全社会特别是管理部门要牢固树立科研时间也是创新资源的观念,强化节约时间意识。二是降低间接科研时间比例,最大限度简化内部管理程序和中间环节,建立科学、多元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三是大大压缩非科研时间的比例,尽可能不安排或少安排一线科研人员参加与科研无关的活动,限定一线研究人员社会兼职数量,最大限度地把行政、社会活动等占用的工作时间降下来。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厉害了,共享单车的“朋友圈”

盖伦跑两会

跟“过气网红”网约车相比,共享单车在两会期间简直火得不要不要的。

先是交通部部长李小鹏为它点赞:“积极和鼓励共享单车的创新模式。”接着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又给它点了个赞:“我先表明我的态度,共享单车我支持。”

就连记者都偏爱它。两会前不少人就开始打听:谁能讲共享单车的代表委员!一场和网络有关的研讨会结束后,记者们将专家团团围住,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那您对共享单车怎么看?

本已经隐退的自行车,靠着共享单车复出了。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就说,共享单车是一场城市复兴运动。它成功引起政府的注意,两个月之前,胡玮炜还参与了政府工作报告总理座谈会。

作为一种不会骑自行车的生物,我也屡次徘徊在黄色和橙色的单车旁边,饥渴地看车后座的二维码,幻想自己已经掌握了“骑车”这种技能。从地铁站到目的地的这段不长不短的路程,若真能用自行车解决,那真是极好的。开完会从驻地离开时,也有记者建议:要不要去门口骑辆车吧?

仅仅半年时间,共享单车仿佛能自我繁殖般渗透到城市各个角落。不过,我也在它

不该出现的地方发现了它——比如我现在住的小区。小区有门禁,共享单车停在这,基本就跟“共享”没什么关系了。

朋友圈里,也常有有人抱怨,看着是五辆单车,结果四辆缺胳膊少腿。这简直了,上哪说理去!

和之前出现的互联网+行业不同,共享单车早已早和政府管理部门“互加好友”,前途大好。只是,问题似乎出在了部分使用者身上。

没事,车可以共享,管理也可以“共治”嘛。比如大家可以“随手拍举报被毁单车”,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再比如,可以建一套骑行者的信用体系,你要是总把单车停在自家楼道里,一旦被举报,就给你扣分;扣到



本报“网红”记者张盖伦

你被共享单车拉黑,要是被拉黑了,你得更费劲才能重新加好友哟。

好多人说,共享单车是人性的镜子。其实“人性”不是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绝对黑,也并非完全白。设计一套好的机制,加上一点好的技术,也能培育出成熟的共享文明。毕竟,还没学会骑自行车的我,也想好好体验一把呢。共享单车,你可得好好活下去呀。

科技、税务、财政等部门要联动推进政策落地。高新技术企业每3年要重新复核认定,这是必要的,但程序太过繁琐,很多企业只得请中介机构代理,无形中增加了负担。要按照放管服改革精神,进一步简化高新技术企业的复核程序,让好政策更容易惠及企业。此外,对初创企业的政策扶持、政府采购、投资联动都要逐项研究,该试点的试点,该推广的推广。

政策好不好,落实没落实,基层和群众最有发言权。浙江基层代表对“最多跑一次”改革最为追捧,说明打到了行政机构和机制的“七寸”。

李克强总理说得好:我们一定要让企业和群众更多感受到“放管服”改革成效,着力打通“最后一公里”,坚决除烦苛之弊、放公平之策、便利之门。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科技厅厅长)

两会视点

莫让成果转化「梗阻」在最后一公里

本报记者 刘垠

“要突破制约产学研相结合的体制机制瓶颈,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都充分活跃起来,使科技成果更快推广应用、转移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特别提到科技成果转化,这让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黄伟光委员欣喜不已。

黄伟光所在的单位,主要培养创新创业人才,也为上海“孵化”科技成果。“我国正在打造从法律到专业机构,再到企业为核心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圈’。”对于成果转化,他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感受,过去人们认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梗阻,迫切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去年以来,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的实施,有效破除了体制机制障碍。

“作为科研活动转变为生产力的‘最后一公里’,从整个创新价值链上来看,科技成果转化表现为周期长、投入大、难度大、成果少,推动起来依然困难。”他说,科研成果能否批量、低成本复制并具备市场价值,还需进一步开发研究、技术调整和验证。一个典型的IT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平均需要1—3年,其他技术则需5—8年甚至更长。

在黄伟光看来,成果转化还面临难度高、成果少的情况。“由于转化过程多为原有研究活动的精确细化(工程化),难以符合科研评价中的‘首创’要求,不易出现‘高档次’成果,多数科学家不愿从事这一工作。”他表示,加之涉及多学科多领域交叉,但目前大部分院校的PI体制难以支撑后续工程化研究,导致科研成果数量巨大,但具备转移转化的成果并不多。

根据近年调研高校和科研机构情况,解放军装备学院原副院长刘建委员剖析,“理想”的实验室环境与“现实”的中试、量产环境差距较大,在科技成果市场前景不明前提下,风险资金难以投入到中试和量产等耗资较大的中间环节,导致很多实验室获得的发明创造难以有效产业化。

“短视性考核制度加剧了科技成果转化难度。许多科研院所对科研人员的考核以自然年为单位,这与科研本身规律相矛盾。”刘建说,即要求科研人员每年必须达到一定科研任务量,而非以研究周期进行考核,使很多科研人员的应用研究项目不是以成果转化为目的,而以结题为目的。“浅尝辄止的研究,自然导致结题的科技成果转化难以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关键点变成老堵点,老问题有什么新解?刘建认为,除培养人才、知识积累、科学研究外,高校和科研机构要把向企业和社会转移转化科技成果作为重要目标,不能只为研究和评奖而研究。

“建议在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上,给予科研院所更大的自主权和政策支持,高校和科研机构应改进和完善职称评定和岗位考核办法,增加应用型科研项目 and 科

研成果转化的指标权重,探索设立成果转化类职称和岗位。”刘建说,要把知识扩散和技术转移作为科技成果转化主要形式,重点通过产学研合作、技术转让和许可等进行转化。

在黄伟光看来,既懂科学、技术、金融,又懂工程、商务和市场的专业转移转化机构将提升转化成功率,政府应建立相应准入标准和监督机制。“让企业、科研院所和大学联手设立研究机构,变以往‘接收成果’为‘联合孵化’,让成果孵化前移至实验室后期,鼓励科学家带着成果走出实验室与企业联合成立合资企业。”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萨德”部分装备运抵韩国

专家称美军得以对我积累数据,战时增强反导能力

本报记者 张强

当地时间3月7日上午,韩国国防部发布消息,“萨德”系统的部分装备已于昨日通过军用运输机运抵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去年12月11日,韩国国防部透露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处理“萨德”部署事宜,并制定了5月部署完毕的方针。从媒体报道看,这一方针正在按计划推进。

对此,陆军驻京某研究所军事专家岳松堂表示,“萨德”是世界最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可以确定,将“萨德”部署到韩国,将有利于美国在平时积累中国导弹导弹的特征数据,并在危机或战时提高反导能力,从而削弱中国对美国的核威慑能力。

“萨德”全称为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是美军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使美国陆军具备对最大射程为3500千米的中程弹道导弹的实战拦截能力。美国陆军共计划组建7个“萨德”系统连,1个连套“萨德”系统由3部发射架(每部携带8枚拦截弹)、1部X波段陆基雷达和1套作战管理/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BM/C3I)子系统组成。

“此次抵达韩国的‘萨德’系统装备包括两部发射架。可以说,这个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岳松堂介绍,未来,每个连套“萨德”系统的发射架将增加到6部,并正在研制增程型“萨德”拦截弹,作战能力更强。

在美国研制的众多动能拦截弹中,“萨德”拦截弹是唯一既能在大气层内(40—100千米)高空拦截目标,又能在大气层外(100—150千米)拦截目标的

动能拦截弹,可对付各种近程、中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其200千米的最大射程尤其适合拦截携带核生化弹头的弹道导弹。

“所以,该系统既能执行战区导弹防御任务,又能执行战略导弹防御任务。该拦截弹由于拦截距离高、拦截高度高,因此有更多交战时间,可以采取‘射击—观测—再射击’的战术模式:先发射一枚拦截弹拦截来袭目标;如果拦截失败,可以再发射一枚拦截弹进行再次拦截。”他说。

资料显示,“萨德”系统的AN/TPY-2高功率X波段相控阵陆基雷达,距离分辨率仅为15—25厘米,能够进行目标搜索、探测、识别、分类、拦截跟踪制导、评估毁伤等,能够对真弹头和干扰目标进行甄别,还能在很远距离上对目标进行精确跟踪。根据任务需要,AN/TPY-2雷达有前沿部署和末端部署两种部署模式。在前沿部署模式下,该雷达是美军弹道导弹防御体系陆基中段反导的重要一环,处于该模式下时,则无法使“萨德”系统始终保持待命状态;在末端部署模式下,该雷达是“萨德”系统连的火控雷达,能使系统始终保持待命状态。

“美国辩称在末端部署模式下不会对部署地域以外的他国构成威胁,但这其实是不值一驳的,因为两种模式切换耗时不超8小时,而且两部以上雷达可分别在不同模式工作。”岳松堂解释,“目前分析,该雷达处于前沿部署模式时,根据被探测目标性质的不同,探测距离大约为500—2000千米之间。可以肯定,‘萨德’将大幅提高对中国中远程导弹的探测能力。”

(科技日报北京3月7日电)

得看创新主体有无获得感

科技厅眼中的两会

周国辉

连日来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两次在全团会议上发言。我对中央政府施政工作,发自内心地给予高度评价,确实带动、给力、提气。

从科技创新工作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相结合,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相结合,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既有宏观的指导性意见,又有微观的方案细则,既有战役方面的运筹谋划,又有战术方面的部署落实,在科研人员的松绑减负、科技成果的“三权”改

革、科研经费的使用管理等方面采取了很多突破力度很大的举措,可以说是指向明确,措施务实,干货很足,为释放改革创新红利、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强保障。下基层调研,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是,企业、科研人员等各类创新主体对科技改革创新的获得感日益增强,政策、体制和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当然,毋庸讳言,各类创新主体对科技改革创新仍有更多的期待。

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供需双方合力。从供应侧看,当前,有的高校科研人员仍“心有余悸”,存在不敢转化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转化政策链条未能有效衔接,政策的宣传、清理和配套要进一步跟上,以切实打通政策落

地的“最后一公里”。

这几年,国家在优化财政科研经费管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突破力度很大,科研人员的反响很好,但需要研究的新情况仍然不少。尤其要进一步发挥好首席科学家和创新领军人才的作用,赋予他们更多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定权,进一步为他们松绑减负。

从需求侧看,主要是调动各类企业的积极性。重要的仍是加强对科技创新法规政策的督查落实。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这是一项普惠性政策,自然深得企业欢迎。但从全国来看,各地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情况并不平